

风险交流、社会共治与食品安全监管关系的实证研究

王翔翔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基于风险交流和静态次优理论的视角,分析了食品安全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治程度对政府食品监管行为的影响并建立模型。进一步探讨了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政府监管资源的投入及政策的稳定性等对不同状态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引入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环境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共治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达到更高、更新的均衡点,从而促进了食品行业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风险交流;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监管;资本存量;政策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F27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6)09-0081-07

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食品安全一直倍受我国政府重视。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人们传统消费观念的转变。但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却不断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上半年因各类食品安全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以上,死伤人数达9000余人。在国际机构颁布的《2015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只占据第42位。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农业、工商等职能部门各自负责,这种表面上的多重保障机制却带来了“囚徒困境”与“搭便车”的情况。与此同时,2015年7月,中国消协公布了十起消费者维权的典型案例,其中有六个案例就涉及到了以前很少见到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情况表明,与以往个别维权的行为比较,即使是普通大众缺乏关于食品安全的专业知识,但对风险的感知迫使他们希望参与到风险决策的过程中。公众参与食品安全,不仅代表着公众对于政府关于食品安全政策实施的认同,而且也反映出公众希望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更多的考虑消费者的实践经验。因此,政府及媒体有责任将及时有效准确的食物安全风险信息传递给普通受众。在此背景下,以信息为中心的风险交流逐渐被学者所接受并展开研究。

2 研究评述

2.1 风险交流

2.1.1 风险交流概述

当我们意识到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制约食品市场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时,我们就有了迫切希望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动机。不可否认,造成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增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诟病、政府信誉机制的不健全、道德层面上的缺失等。食品安全情况是复杂的,但这些因素的存在恰恰使得我们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是多方面的系统性的风险,并不是单一的监管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引进更多的治理元素,针对不同地区灵活地选择治理模式。

在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面,生产者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并不能很好的履行产品质量契约。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事件一旦爆发,食品企业的危机公关、政府的处理措施以及媒体的报道情况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传递给消费者,这些都使得食品安全事件难以处理。因此,如何保证各利益相关者能够接受到及时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就成为了研究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风险交流作为“有效的民主对话”,就成为一种治理机制进入了学者们的视线。

风险交流,也被称为风险沟通,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科学文献中出现。早期的风险交流更类似于信息告知,掌握信息优势的主体单向的进行信息传播。这种方式几乎没有反馈机制,因此早期更多的是

收稿日期:2016-05-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南省联合基金子类)(U1304706);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32102110114);河南工业大学校研究基金项目(2014SKJJ08);河南工业大学2015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PY_M2015020)。

作者简介:王翔翔(1991—),男,河南信阳人,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风险交流。

被用于辅助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随着人们对于风险交流认识的加深,1983年,美国国家委员会(NRC)首次明确风险交流应单独成为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元素,并于1989年将风险交流定义为“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由于涉及到风险特征及相关信息的多个侧面,使得风险交流作为一种信息交换过程,能够应用的领域被大大扩展。

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对于风险交流的认识也不断有了新的突破。Frewer^[1]提出,为使风险交流达到对话、解决冲突和建立共识的目标,政府机构和组织必须考虑到普通公众的恐惧感和挫折感以及任何相关的技术信息。这就改变了以前的基于线性的、单向的风险交流观点。Leiss^[2]更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归结为“风险管理者的黄金法则是:始终以相关的‘危害+担忧’为中心”。基于Frewer的研究,Heath^[3]和Palenchar^[4]倡导“社区关系和风险交流”的融合,认为这种融合型努力能够在政府机构、行业以及其余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这些概念的提出给了国内学者很大的参考价值,如吴林海^[5]认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及时准确地发布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的信息,消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恐慌。刘飞^[6]进一步指出以重建制度信任的为

主要目标,以风险交流为主要手段的食品安全软治理模式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这些研究均使得风险交流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进一步被挖掘。

2.1.2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风险交流

研究表明,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食品质量的信用品特征和信息不对称,不建立有效的信息发现、显示和信誉机制,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在我国,政府充当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角色,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成立了多个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管,但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仍然频繁出现。一方面,多重保障机制的存在使得“政府监管信誉”成为公共品,为了防止监管成果被其他部门所利用以及防止别的部门将责任推给自己,各个部门似乎都会有选择的发布一些正面信息,隐藏负面信息。这些信号资源高度分散且缺乏可信度,使得我国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严重脱节。同时,我国的这种多部门分段监管模式有着很深的行政体制的影响,这同样使得各监管部门愿意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监管权利而不愿负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在这种多重保障机制下,政府过多的承担了本应由其余的市场主体承担的搜寻信息成本,虽然这降低了交易主体的不确定性,但却不利于供应链一体化的形成,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将风险交流引

入到食品安全监管中,实施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措施建立政府的一体化监管就成为一种必然。

国外多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了将风险交流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如2010年的涉及5个州及地区的德国农场“二恶英毒饲料”事件、2011年美国蔬菜感染李斯特菌致病致死事件、2013年新西兰牛奶残留双氰胺事件以及2014年日本爆发的十年来最大的食物中毒案等。这些与风险交流有着重要关系的案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如戚建刚^[7]借鉴德国食品理论界及企业的做法,用公平、胜任、效率以及问责的可得性为参照系,以过程论为分析视角,认为我国的食物行业在大部分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特别是在问责的可得性上,信任危机尤为突出。王秋石^[8]则具体研究了如何解决该信任危机,提出了食品安全治理改革的路径探讨。

以上的事实表明,食品安全治理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监管资源也是有限的,质量的监管还需要借助市场化的认证组织、行业协会、媒体、消费者等来共同实施。因此,新形势下,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共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

2.2 社会共治

Eijlander^[9]对于社会共治有个被广泛认同的定义:社会共治作为一种针对某特定问题的管理手段,它需要监管主体的监管及自我监管,并鼓励其余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Martinez^[10]更进一步将其引入到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他认为从无管制到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监管措施是逐步进行的,政府应承认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并能够针对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措施,从而促进食品安全激励机制的形成。Rouviere^[11]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成果,他从这些不同的阶段中,重点研究了从政府传统监管到社会共治这一过程,发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对食品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态度是否从处罚转变为预防。从这个程度来说,社会共治与风险交流一样,强调的是事前的风险管理,而不是事后的危机处理。

我国学者对此也有相应的研究。彭亚拉^[12]指出,食品安全属于复杂的公共问题,具有涉及面广、利益相关者多、以及没有科学定论等特点。因此,仅仅依靠单方的力量很难达到监管的效果。这在国外的实践中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在欧洲,政府鼓励食品生产企业采取风险分析和控制关键环节的管理体系,同时督促企业选择规范的认证机构对企业产品进行认证。在这种保障下,一方面消费者能够从这些权威

机构中获得准确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另一方面,由于认证的客观性,也使得食品企业在寻找合作企业时更加方便,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Fairman^[1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证明了这项措施对于控制食品安全的有效性。

因此,在食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背景下,我国食品行业的风险交流面临的挑战更加巨大。社会共治,其实质为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协作进行,它与风险交流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食品安全中,二者均涉及到政府、食品企业、消费者、媒体等利益相关人,风险交流保证了实施社会共治的环境基础,社会共识又反过来促进构建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环境,从而共同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完善。

由以上可以看出,大部分文献对于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风险交流行为都集中于解释其在食品监管中的重要性及对策研究,属于定性的研究,定量的研究却很少。基于此,本文拟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代表食品企业、消费者以及政府的模型框架,运用静态次优方法讨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对于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私人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探讨社会共治背景下,风险交流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关系。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三节建立模型,给出假设,并运用静态次优方法检验行为选择的有效性对于各变量的影响,从而验证各推论;第四节用案例再次来验证给出的各推论;第五节给出总结与展望。

3 模型与变量

假设模型中的消费者采用的是食品企业生产的某单一产品,借鉴 Turnovsky^[14]提出的观点,将政府能力 g 引入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其中 g 代表社会共治中政府的努力水平,本模型设定为实际表现为政府监管投入资源转化度,并限定为政府直接投入的监管资源对于消费者购买力度的影响, h 为社会共治中消费者愿意的努力水平, m 为消费者愿意购买的私人消费,该效用函数满足二阶连续可微,即 $U_t = \mu(m, h, g)$, 根据效用函数的特征有:

$$u_m(m, h, g) > 0, u_g(m, h, g) > 0, u_{gg}(m, h, g) < 0$$

对于食品企业的生产函数,仍根据 Turnovsky^[14]提出的观点,规定产出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即:

$$\text{产出 } y = f(k, L, g)$$

其中, k 代指消费者的私人资本存量, L 代指消费者的私人劳动投入,通常固定为 1, g 仍代表政府监管投入资源转化度,并限定为政府直接投入的监管资源

对于消费者购买力度的影响。因此,食品企业的生产函数就简化为 $y = f(k, g)$ 。该生产函数仍满足二阶连续可微的条件。

在给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食品企业的生产函数后,对于消费者来说,私人的资本存量路径和消费路径如下:

$$k(0) = k_0$$

$$\max_{m, g} \int_0^{\infty} U_t(m, h, g) e^{-\rho t} dt$$

$$S \cdot t \cdot \frac{dk}{dt} = (1 - p)f(k, g) - m - h$$

其中, $k(0)$ 代表消费者初始资本存量, k_0 为一常数, $e^{-\rho t}$ 代表折现因子, ρ 代表折现率,范围为 $(0, 1)$, p 为税率, $(1 - p)f(k, g) - m - h$ 指消费者新增资本。

因此定义消费者此时最优选择的 Hamilton 方程为:

$$H = U_t(m, h, g) + r[(1 - p)f(k, g) - m - h]$$

其中, r 代指 Hamilton 乘子,表示状态变量的边际值,在实际应用中指的则是消费者的私人资本存量每提高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效用变化。

此时,消费者若要达到最优选择,则应存在一阶必要条件,即要存在 $\mu_m = r, \mu_g = r, \mu_h = r$, 只需要 $\frac{\partial u(m, h, g)}{\partial m} = r, \frac{\partial u(m, h, g)}{\partial g} = r, \frac{\partial u(m, h, g)}{\partial h} = r$ 。

同时,给出状态变量的 Euler 方程,它表示消费者跨时选择的无套利性:

$$\frac{dr}{dt} = r \cdot \rho - r \frac{\partial [f(k \cdot g)(1 - P) - m - h]}{\partial k}$$

最后,给出横截性条件,它表示了在经济结束时,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贴现值为零,即 $\lim_{t \rightarrow \infty} m k e^{-\rho t} = 0$ 。

再给出政府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模型。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其直接投入的监管资源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对食品企业征税是该监管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一般来说,政府能够通过征税,发行新的债券等来取得收入,但在本文中,为控制影响因素,暂不考虑发行债券对于 g 的影响。因此,在约束条件和消费者最有行为选择的约束下,我们给出政府的行为路径如下:

$$k(0) = k_0$$

$$\max_{(k, P, m, g)} \int_0^{\infty} U[m(r, h, g), g] e^{-\rho t} dt$$

$$S \cdot t \cdot \frac{dk}{dt} = (1 - p)f(k, g) - m - h$$

$$S \cdot t \cdot \frac{dr}{dt} = r\rho - r(1 - p) \frac{\partial f(k, g)}{\partial k}$$

$$g \leq p \cdot f(k \cdot g)$$

其中, $g \leq p \cdot f(k \cdot g)$ 表示此文限定的政府监管费用主要来源于税收, 为政府行为的约束条件。

同样定义政府为谋求社会最大化福利做出的最优选择的 Hamilton 方程:

$$H = U(m, h, g) + \lambda_1 [(1-p)f(k, g) - m - h] + \lambda_2 [rp - r(1-p) \cdot f(k, g)] + \lambda_3 [P \cdot f(k, g) - g]$$

其中, λ_1, λ_2 代指 Hamilton 乘子, 分别表示状态变量 k 的边际值以及该边际值的边际值, λ_3 为 Lagrange 乘子。与消费者的最优选择类似, 我们分别给出政府监管部门的最优性条件、Euler 方程以及横截性条件, 如下所示:

首先对 g 求导, 可以得出:

$$\frac{\partial U}{\partial g} + \frac{\delta \lambda_1 [(1-p)f(k, g) - m - h]}{\delta g} + \frac{\delta \lambda_2 [rp - r(1-p) \cdot f(k, g)]}{\delta g} + \frac{\delta \lambda_3 [P \cdot f(k, g) - g]}{\delta g} = 0$$

其中, $U_t = \mu(m, h, g)$, 运算简化后为:

$$\frac{\partial U}{\partial m} \cdot \frac{\delta m}{\delta g} + \lambda_1 (1-p) \frac{\delta f(k, g)}{\delta g} - \lambda_2 r (1-p) \frac{\delta f(k, g)}{\delta g} + \lambda_3 P \frac{\delta f(k, g)}{\delta g} - \lambda_3 = 0$$

接着对 k 求导, 同样简化运算, 可以得出:

$$-\lambda_1 p \frac{\delta f(k, g)}{\delta k} + \lambda_2 r p \frac{\delta f(k, g)}{\delta k} + \lambda_3 p \frac{\delta f(k, g)}{\delta k} = 0,$$

式子中 p 可同时消去。

再给出状态变量的 Euler 方程, 如下:

$$\frac{d\lambda_1}{dt} = \lambda_1 p - \lambda_1 (1-p) \frac{\delta f(k, g)}{\delta k} + \lambda_2 r (1-p)$$

$$\frac{\delta [\frac{\delta f(k, g)}{\delta k}]}{\delta k} - \lambda_3 p \frac{\delta f(k, g)}{\delta k}$$

$$\frac{d\lambda_2}{dt} = \lambda_2 \rho - \frac{\partial U}{\partial r} + \lambda_1 \frac{\delta m}{\delta r} - \lambda_2 [\rho - (1-p)$$

$$\frac{\delta f(k, g)}{\delta k}]$$

最后给出横截性条件:

$$\lim_{t \rightarrow \infty} \lambda_1 k e^{-\rho t} = 0, \lim_{t \rightarrow \infty} \lambda_2 k e^{-\rho t} = 0.$$

以上即是给出了消费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性选择系统, 对于食品企业、媒体等其余食品安全利益相关人的分析也是这样, 为了简化起见, 就不再给出模型。因此, 这就完成了包括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食品企业以及媒体等在内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模型。

为了简化计算, 我们仍根据 Turnovsky^[14] 的做法, 采用静态次优方法, 将上述系统转化为一个静态

的优化问题进行求解。

假设 $\frac{dk}{dt} = \frac{dr}{dt} = 0$, 则此时包括政府直接投入的监管资源、税收税率、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以及私人消费在内的函数系统就转化为一个静态的优化选择系统, 如下:

在约束条件 $g = p \cdot f(k \cdot g)$ 存在的情况下, 存在函数 $\max_{(p, k, m, g)} U(m, h, g)$

$$S \cdot t \cdot \frac{dk}{dt} = (1-p)f(k, g) - m - h = 0$$

$$S \cdot t \cdot (1-p) \frac{\delta f(k, g)}{\delta k} - \rho = 0$$

我们假设 $U(m, g) = I_n m + I_n g + I_n h$, $f(k, g) = Ak^\alpha g^\beta$, 其中, A 为假设固定的常数, α 为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的变化率, β 为政府直接投入监管资源及政策的稳定性, 给出最终模型对应的 Lagrange 函数:

$$L = I_n m + I_n g + I_n h + \lambda_1 [(1-p)Ak^\alpha g^\beta - m - h] + \lambda_2 [(1-p)A\alpha k^{\alpha-1} g^\beta - \rho] + \lambda_3 [pAk^\alpha g^\beta - g]$$

$$\text{对 } p \text{ 求导有: } -\lambda_1 Ak^\alpha g^\beta - \lambda_2 A\alpha k^{\alpha-1} g^\beta + \lambda_3 Ak^\alpha g^\beta = 0$$

$$\text{对 } k \text{ 求导有: } \lambda_1 (1-p)Ak^{\alpha-1} g^\beta + \lambda_2 (1-p)A\alpha(\alpha-1)k^{\alpha-2} g^\beta + \lambda_3 pAk^{\alpha-1} g^\beta = 0$$

$$\text{对 } m \text{ 求导有: } \frac{1}{m} - \lambda_1 = 0$$

$$\text{对 } g \text{ 求导有: } \frac{1}{g} + \lambda_1 (1-p)Ak^\alpha g^{\beta-1} \beta + \lambda_2 (1-p)A\alpha(\alpha-1)k^{\alpha-1} g^{\beta-1} \beta + \lambda_3 (pAk^\alpha g^{\beta-1} \beta - 1) = 0$$

$$\text{对 } h \text{ 求导有: } \frac{1}{h} - \lambda_1 = 0$$

本模型得到的第一个结果为, $m = h = \frac{k}{\beta}$, 此式
中 ρ 为贴现因子, 为一常数, 则该结果表示的是在消费者资本存量 k 固定不变时, 政府直接投入监管资源及政策的稳定性 β 与消费者私人消费 m 成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不难解释, 在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一定的情况下, 由于消费者惯性、短视的特性, 更倾向于已经熟悉的消费环境, 即倾向于有着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环境的市场。而政府长期稳定的监管体系恰恰是维护这种市场的有力工具。因此, 当政府的监管资源发生变化时, 如对某项未知产品监测规格的公布, 消费者不会立即做出反应, 而是会观察一段时间, 从而做出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因此, 本文给出以下推论:

推论 1: 社会共治背景下,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建立长期稳定的监管机制有助于食品市场的稳定和中国政府信誉机制的完善。

推论 2:政府监管部门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时,应考虑到公众的担忧,不应出台过多的应急性方案。

此模型的第二个结果为 $k = \frac{g \cdot (1-p)\alpha}{P \cdot \rho}$, 由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在政府税率、政府监管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政府监管支出的有效性与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成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政府提高直接投入食品安全监管的支出(包括资金、设备、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等),导致消费者私人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提高,进而刺激消费者的个人投资行为,导致更高的新的私人资本存量的均衡点的出现。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推论:

推论 3: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越是完整的地区,消费者对于该地区食品安全的信心越充足,在社会共治中愿意进行努力的程度也越高,越容易建立实施有效风险交流的市场环境。

第三个结果为 $\frac{\rho}{A\partial K^{\alpha-1}g^{\beta}} = 1 - P$, 假设在政府监管资源投入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消费者的私人资本存量与政府税率呈现一定区间内的正相关关系。这也不难解释,在风险交流进行的比较充分的某项交易中,资本存量的增加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环境能够促使消费者产生投资行为,进而会刺激消费,导致食品企业的规模扩大,国家可以相应提高税率来增加国民收入。但这种税率的增加不是无限期的,私人消费增加导致的税基增加,使得政府能够在不改变甚至是降低税率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预算,因此维持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环境对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推论:

推论 4:有效的风险交流能够使得政府在不改变甚至是降低税率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各项预算,有助于维护食品市场发展的稳定。

推论 5:对于消费者来说,资本存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私人消费的增多,还要受到所处食品市场的进行风险交流的程度的影响。

以上即是本文模型推出的结论,接下来的章节准备用 2013 年农夫山泉的“标准门”事件来验证得出的推论,以期对食品安全监管有实际的指导价值。

4 案例选择与相关讨论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9 月 26 日,系养生堂旗下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农夫山泉。2013 年 3 月,农夫山泉爆发“标准门”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虽然事后证明其产品并没有质量问题,但农

夫山泉在此次的事件中消极的风险交流态度,导致其余博弈参与者对农夫山泉品牌的信心和预期明显不足,从而使得自身陷入食品安全风险危机中。因此,选择此案例来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推出的几个推论更有价值。

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监管部门的反应是此次事件持续发酵的原因之一。其中的一个争论点就是农夫山泉执行的“DB33/383—2005 瓶装饮用天然水”标准是否高于国家标准和是否已经自行废除。媒体指责农夫山泉执行的饮用水标准混乱,并且低于国标。而农夫山泉坚称自己执行的是浙江省颁布的最新的饮用水标准。这种争论中,就暴露出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混乱问题。如果浙江省监管部门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监管措施,如组织专家结合实际,颁布稳定有效、有实际可操作性的饮用水标准、对农夫山泉的取水口周边环境开展不定期的检查以及督促农夫山泉同公众和媒体等保持良好的沟通环境,将这种监管机制长期化、常态化,也不至于使得媒体来爆料这些事情,使得农夫山泉在此次事件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这也就证明了我们提出的推论 1 和推论 3。

实际上,政府的某些担保和承诺恰恰可以起到消除悲观情绪和建立公众信心的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普通消费者在惯性作用下造成的“粘滞性”使得他们并不能在每个阶段都使自己的行为最优化,短视特性则使他们并不会考虑到他们的偏好以及决策所造成的后果。因此,McComas^[15]指出,当风险信息没有考虑到公众的担忧时,风险信息将遭到失败。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时,不能只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已经做出的决策的理由,而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受众的风险偏好,建立双向交流机制。在此次标准门事件中,事件告一段落的原因也是最后权威政府监管机构认定农夫山泉产品没有问题,才导致的后期的舆论风向偏向农夫山泉,农夫山泉才得以走出困境。这充分证明了推论 2 中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在制定标准时应考虑到公众的担忧这一观点。

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的是分段管理,这种表面上的多重保障机制导致的却是监管权力的滥用以及监管资源的浪费等。这种低效的监管体制带来的怪现象就是高投入的监管预算带来的却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发生。正如 Buchanan 所论证的,政府一方面希望获得监管的资源 and 权利,另一方面又不想承担责任,因为保障安全是需要成本的。我国学者对这种现象也有研究,刘凤委^[16]提出,政府进行的风险交流越少,地区间信任度就越低,企业间就

会较多的采用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等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这实际上并不利于本地区的市场发展。

因此当政府监管部门必须对被监管对象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时,政府就会采取积极的风险交流措施以使自己处于具有信息优势的地位。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完善监管体制所需的资源投入,还可以促进整个食品行业的良性竞争。这实际上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应用^[17]。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态度也是此次事件中影响因素之一。上文已经指出,在我国,消费者的忠诚度并不能简单地靠塑造品牌能力来维持,农夫山泉在事件爆发的前期,坚持放任自流的态度,认定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并企图靠消费者的忠诚度将媒体的指责归为无稽之谈。但北京地区农夫山泉销售业绩的急剧下滑却否决了这种想法。在这种闭塞的风险交流环境中,消费者不能及时得到来自农夫山泉的正确的风险信息,对风险的规避使得他们本能的选择农夫山泉的其余替代品。因此,在此次事件中,消费者在政府权威机构发声前后,对于农夫山泉不同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就是推论4和推论5中所提到的问题。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讨论了社会共治背景下的风险交流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

不同程度的社会共治和风险交流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次数(事前预防)上,而且表现在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应对(事后处理)上。本文用社会共治中政府的努力水平(定义为政府监管投入资源转化度,并限定为政府直接投入的监管资源对于消费者购买力度的影响)来衡量社会共治程度的实施效果。在假设政府的努力水平能够被其余利益相关者观察到的前提下,运用 Turnovsky 的静态次优方法,我们发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共治和风险交流水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显著不同。从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良性循环的角度考虑,提高社会共治中政府的努力水平,有助于积极有效的风险交流环境的形成,这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作用更大。

5.2 研究启示

1)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加大政府直接投入监管资源的力度,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和防范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确实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在于,食品安全由于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再加上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又容易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的恐惧感迫使他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到

监管过程。国家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他们做出的承诺恰恰能够起到保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预期和信心的作用。因此,加大政府直接投入监管资源的转化力度,能够恢复消费者的信心,直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拓宽信息流通渠道,使得政府监管措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这对于完善我国政府信誉机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2)由于政府的努力水平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政府投入监管资源的力度(即数量)上,而且表现在监管资源的转化力度(即有效性)上。因此,政府在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措施时,在关注直接监管资源投入的数量的同时,还要关注这种投入的有效性上。我国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不可谓不重视,各种监管措施也覆盖了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相对完善,但食品安全的事件仍层出不穷。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权利分散,监管资源的浪费等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通过理论形成和数理建模研究重点考察了不同社会共治和风险交流程度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以为今后的大样本的研究提供基础;同时,研究者也可以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探讨食品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共治和风险交流控制其交易成本,从而提高食品安全控制质量。

参考文献

- [1] FREWERL. Communicating about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ust[J]. Risk Analysis, 2013(23): 1117-1133.
- [2] LEISS W. Searching for the public policy relevance of the risk amplification framework[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5-57.
- [3] HEATH R.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risk communic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emergency response messages[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00, 12(2): 131-161.
- [4] PALENCHAR M J, HEATH R L. Terrorism and industrial chemical production: a new era of risk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05, 22(1): 59-67.
- [5] 吴林海. 基于随机 n 价实验拍卖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与补偿意愿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2): 60-72.
- [6] 刘飞. 风险交流与食品安全软治理[J]. 学术研究, 2014(11): 60-65.
- [7] 臧建刚. 论我国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之信任危机[J]. 云南社会科学, 2015(4): 122-127.

(下转第 105 页)

[J]. 科学学研究, 2005(8): 525—530.

[32] 房汉廷. 中国创业奉献投资的十大关系[J]. 中国高新区, 2007(10): 21—26.

[31] 吴隆增. 组织学习、知识创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1): 110—114.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Business Angel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HE Dong-hua, ZHOU Dong-mei, CHEN Yang, LU Ruo-y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Business angel investment will not only provide a certain financial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but also through the way of management to provide value-added services to be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the call of the public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peoples', Internet start-ups emerge in endlessly, repeatedly verified iteration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lean start-up, in the product by the creative generation to MVP (minimum visualization prototype) to product market, product user experience and product market size ar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hrough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nstruct 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 theory model, an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vestmen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for angel investment and new ventures in the process of two-way choice and investment interaction behavio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new ventures;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angel investment; post investment management;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上接第 86 页)

[8] 王秋石. 食品安全治理改革障碍与路径探析[J]. 当代财经, 2015(8): 71—78.
[9] EIJLANDER P. Possibilities and constraints in the use of self-regulation and co-regulation in legislative policy; experiences in the Netherlands—lessons to be learned for the EU[J].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5, 9(1): 102—114.
[10] MARTINEZ M. Coregulation as a possible model for food safety for public-private[J]. Food Policy, 2007, 32(3): 299—314.
[11] ROUVIERE E. From punishment to prevention; a French case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regulation in enforcing food safety[J]. Food Policy, 2012, 37(3): 246—254.
[12] 彭亚拉. 论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J]. 食品工业科技, 2014, 35(2): 18—22.

[13] FAIRMAN R. Enforced self-regulation, prescription, and conceptions of compliance within small businesses; the impact of enforcement[J]. Law & Policy, 2014, 27(4): 491—519.
[14] TURNOVSKY S.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5(19): 747—786.
[15] MCCOMAS K.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meetings used for risk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3(31): 164—184.
[16] 刘凤委.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 经济研究, 2009(8): 60—71.
[17] 王殿华. 国际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与全球体系构建[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11): 169—173.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Risk Communication, Social Work and Food Safety Regulatory

WANG Xiang-x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isk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to all stakeholder food regulatory behavior and establish the model, the influence of using static suboptimal method to discuss the private capital the rate of change of consumers, government direct investment regulatory resources and stability of policies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ate variables, from a deeper level to discuss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ood safety regul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consumption, make consumers to private capital to achieve higher new equilibrium, promote the virtuous cycle of the food market.

Key words: risk communication;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of food safety; capital stock; policy stability